

澳门中文报纸 在抗战末期的新闻编辑框架研究

柳旭东 黄瑚

摘要

本文分析了澳门中文报纸于抗战末期在编辑上的框架构成,通过分析《市民日报》、《复兴日报》以及《复兴晚报》发现,该时期的报纸国际新闻无论在版位占用版面空间及编辑素材上被优先处理,突出表现在标题的磅数占优势及新闻图片图表的程式化使用。与此反差的是,中国内地新闻往往被与国际新闻混合编排,而当地新闻重视民生淡化政治,在版面上在版面上却未占重要地位。本文也对形成澳门“孤岛”编辑模式的原因做了初步推论。

关键词

新闻检查、国际化、框架、民生新闻、新闻图表

作者简介

柳旭东,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媒介心理,公共舆论和报纸传播效果。电邮:xdliu@must.edu.mo.

黄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The Frame of Macau Chinese Newspaper at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udong, HUANG Hu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rame of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s at Macau at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 war. An investigation on Jornal Do Cidadao, Renaissance Daily and Renaissance Evening Post finds that International news is premier on the news pages, in terms of spaces taken, editing tactics diversity, headline fonts, and routine use of graphics and information based graphic. In a contrast, news in Mainland China was typically combined with international news on newspaper layouts. Local news focused on civic concerns while minimizing political issues, but it failed to claim prominent layout positions.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frame feature of Macau newspapers during this era.

Keywords

censorship, internationalization, frame, civic journalism, inforgraphic

Author

Liu Xudo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Art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xdliu@must.edu.mo.

Hu Huang is professor at the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抗日战争期间,与澳门接壤的包括广东省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相继沦陷,由于当时统治澳门的葡萄牙政府的中立立场,澳门并没有被日军占领。各种势力于此期间在澳门发展新闻报刊业务,其中文报纸一直在发行量上居于领先地位(吴文博,2009)。但是当时的葡澳政府基于本国的政治立场,对澳门的新闻媒介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禁止新闻报道出现同情支持中国正义抗战的文字,因此该地区的新闻媒介环境形成了与当时上海租界相类似的“孤岛”特色。

相比于上海“孤岛”时期新闻事业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澳门新闻业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运作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对于澳门中文报纸在抗战时期的报纸新闻编辑分析更是尚未发现有研究涉及。本研究通过分析澳门在抗日战争末期的中文日报,试图发现该地的报纸,在这一独特历史时期的编辑特色。分析报纸的本源即其编辑中所展示的文本,可以用探索性的发现为相关的后续研究作一定的基础。

一、“孤岛”新闻检查制度

抗战时期的澳门推行的是复杂的对于新闻出版进行限制的制度。一方面,从1820年开始,葡澳政府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背景下的《新闻自由法草案》,并停止推行1737年生效的禁止海外属地出版报刊的法令(张荣显,1998)。对于报纸出版的解禁,在制度和理论上促进了澳门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此对应,澳门在1822到1837年间诞生了80份以上的葡文和中文报刊。其中的中国较早的外文报纸《蜜蜂华报》和中文报纸《镜海层报》,都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行。抗战初期,澳门报业同样获得了相对宽松和“真空”的出版环境。香港沦陷及与其相连的广东地区相继处在日本占领之下,澳门在政治上成为“孤岛”。但由于澳门获得葡萄牙政策延伸的中立国地位,该地区成为人员与抗战物资的相对安全的中转站。因此在抗战初期,澳门民众以报纸,音乐及戏剧等形式支持内地抗战,以狭小的三十平方公里总面积之地,设立了三四百个此类救亡团体。除了原有的报纸,一些新的报纸也创办,如《华侨报》从1937年11月20日开始发行。其中的许多报纸,如《大众报》和《华侨报》在抗战前后继续新闻业务,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依旧在澳门公开发行。

另一方面,虽然澳门和香港都是殖民国家的飞地,但是其殖民统治对于新闻检查的严格程度却绝然不同。澳门在开埠以来就仅享有非常有限的新闻自由,新闻检查制度长期存在,直到1977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在澳门实施后才被消除(谭志强,2009:429-442)。虽然澳门报业自1820年以来处在理论上自由的状态,其当地的新闻业实际上一直处在“威权政治”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即使到了1977年澳门变成脱离“新闻检查制度”的“自由报业制度”的城市一直存在(Tam,2003),新闻业通常在自律的条件下保持着相对的自由。新闻出版检查的表面松懈,更在抗战时期发生了反转,被模棱两可的却范围广泛的新闻预检制度取代。葡澳政府禁止民众以“救国”,“救亡”“抗日”“抗战”“日寇”“敌伪”等文字标注内地的抗战形式及事件,当地民众选择以“救灾”来隐喻“救亡”运动(澳门日报,2012:C05)。对于报纸等平面媒体,葡澳政府延续了对于社团活动的限制,从1838年开始施行新闻检查制度,相关文字也禁止出现在版面上,报纸在“开天窗”之外,只能以“X”“口”等符号间接的替代被禁止出现的文字(澳门日报,2012:C05),如“日军”使用“XX”来替代。这种新闻检查制度从1938年开始,延续到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后。宏观的新闻政策,影响记者的工作方式,以及报纸与政策互动应对,具

体表现在在新闻取舍以至于新闻文字的风格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分析在这种特殊的“孤岛”新闻检查政策背景下,澳门报纸在新闻报道框架上的具体呈现。

二、研究方法

媒体再现现实导致人们片面认识周围环境,而媒体的这种功能实现首先是通过对于新闻事实以及其他信息的有效选择与放大来获得。这种选择及对应性突出处理,就是动态框架(frame),也就是“选择认为的事实中的某些侧面并在传播文本中加以彰显,以此来提升对于特殊问题的定义,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者推展被描述的个体”(Entaman,1993: 52)。在新闻微观采访与写作上,记者可以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从多角度再现,如战略和政策,道德和物质,事件或主题(Shah, Kwak, Schmierbach & Zubric,2004),在理论与实践上每篇新闻都是对个体事件与再现手法选择的过程。从宏观上看,报纸整体的框架过程是个体新闻选择与区分优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于社会的议题的选择与整合及在媒体空间上或强化,或弱化展示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报纸编辑框架是一种对于社会议题的一种呈现偏见(establishing bias),是编辑部对于新闻扮演“把关人”的具体形式。与微观的个体新闻报道同理,报纸的宏观编辑框架可以从多个层面得以表现,比如同一条新闻不同报纸编排在哪个版面或同一版面的哪一位置,都反映了编辑的整体框架理念。

以前的报纸研究集中于微观的具体新闻框架分析,对于报纸的整体框架定义解读重视较少,测量框架的类别编码解读也较少。新闻框架研究可以以单个体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点来对内容进行编码,也可以在总体上对报纸的编辑手段表现出的类别进行挖掘,从而探索报纸总的编辑架构方式,进而分析报纸在进行报道时的核心理念。本文的编辑框架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在版面上各种报纸文字与其他信息元素是如何被互动展示的。由于报纸的版面设置及编辑的因素是常规(routine)与相对固定(consistent)的工作,对于同类新闻题材的不同新闻信息在版面上的总体处理方式变化细微,所以本研究的编辑框架分析主要采取质化方法进行分析归结,对于具体的版面内容同时进行简略的文本分析。

本文在对澳门报纸尽可能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但是澳门在抗战时期的很多报纸付之阙如,这限制了对于随机抽样设计的实现。应对这种资源状况,本研究只是随机抽取了现存的澳门“《市民日报》”、“《复兴日报》”及“《复兴晚报》”,其中《市民日报》抽取了60期,时间跨度为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复兴日报》在抗战末期的1945年7月21创刊,所以其从创刊到抗战胜利的当月16日都被抽取,《复兴晚报》也抽取了相同时期的样本。这种抽样方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可以获得的澳门报纸的情况。但是基于这些样本的编辑框架状况的研究发现,可能受到报纸代表性的程度的制约,其他的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偏离于发现的编辑框架。

三、国际新闻优化编排

新闻的内容及编辑框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的丰富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这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如记者编辑的多寡及其个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敏感度及把握程度,也包括报社拥有的财力物力,是否能够保证新闻的采访写作有效地得到执行。另外这种资源,也包括报社外部的社会环境,如法律的限制与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后者是制约新闻采写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环节经常被忽视。

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并非意味着澳门报纸趋向于特派记者采访战事,而是指该地区的报纸善于充分使用外来的稿件资源,通过编辑部的突出处理,来弥补报社内部资源的不足,同时也满足澳门读者对于抗战有关新闻事件的关注,以扩展报纸的发行量,或在客观上支持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香港的陷落,澳门成了远东地区与欧美各国信息交流传递的“中间站”,各种消息在此停留并转发各地(查灿长,2006)。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的国际报道,通常是采用各国际通讯社的稿子,如1945年2月1日的国际新闻版有关于美军在太平洋反攻的一组集纳报道,稿件来源有“珍珠港电”,“路透电”“菲岛麦克阿瑟总部电”。

对于国际新闻的突出编排首先表现在有关国际新闻报道占了报纸相当的版面。在《市民日报》的版面上,国际新闻通常占据报纸的第四版的整版篇幅,《复兴日报》和《复兴晚报》在二战后期甚至分别使用两个版面来报道各地战局,而报纸当时通常只有四个版面。相对的,《市民日报》上本市新闻往往占据头版下半部分四分之一的专栏位置。从每一篇稿件的字数看,国际新闻最常见的形式是以集纳的方式,将相关的新闻组合为长度超过千字的报道,而本市新闻则往往是离散的多则三四百字,少仅有几十字的“豆腐块”。如1945年2月1日头版的一条新闻,“建筑行同人 庆祝鲁班诞”整片报道只有76字。在《复兴日报》和《复兴晚报》的版面上,国际新闻通常被放在头版的位置,本埠新闻则退居二版。

更重要的是,在新闻题材上国际新闻版面也是最丰富的,不仅有消息与通讯,而且往往配有评论,以显示编辑部对于国际问题的重视。评论的主要功能常常是新闻不能替代的,它提供了交换信息与观点的平台,并且通过展示立场给社区树立报纸作为意见领袖的角色(Hynds,1994)。如《市民日报》在1945年左右每天设置“今日世界”栏目,对于最重要的有关二战局势的新闻事件加以评论,表明编辑部对于国际时局的态度和立场。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巩固联盟,通过会议来积极讨论战后如何应对复杂的局势,2月1日的《市民日报》即发表题为“伐交”的评论文章,为读者对这种联盟的角色与运作加以解读。而配合欧洲战场苏军即将围攻柏林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积极反攻,1945年2月2日的《市民日报》配发了题为“天地人与点线面”的评论,文字充满了对正义事业胜利的乐观评估。再如1945年7月24日的《复兴日报》的头版头条是“杜鲁门将提出讨论远东作战问题”,并在同一版发表有关欧洲局势的社论“地中海是谁的海”。在新闻版面上配发评论,直接反应了报纸编辑部对该新闻题材及版面的重视。

对于国际新闻的突出编排还表现在编辑手段的多样化。20世纪中叶的报纸还没有进入图片优先的时代,大多数的报纸版面上文字通常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而图片新闻,包括新闻照片与新闻图标是非常罕见的新闻表现材料。展示新闻的重要性,通常是以标题字号的放大与新闻在报纸编排位置上的提升来实现。这种报纸的编辑总趋势,被适用于澳门的所有报纸,以及主要的报纸版面。但是,新闻编辑的通常手段在国际新闻版面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特色的最显著的例证是新闻照片的大量使用,如1945年2月2日的《市民日报》在第四版的国际新闻版,编排了六张照片来配合欧洲六国即将全面解放的报道,而在同日该报的其他3个版面上,却无一张新闻照片。

在新闻照片之外,澳门中文报纸对于新闻图表也有了较多的使用。在1945年2月2日的版面上,发布了题为“马尼拉与星家坡距离图”的地图图表,来方便读者直观地阅读“美军距马

尼拉甘五里 复登临克兰地岛”新闻。地图图表是信息图片(inforgraphic)的一种形式,后者使用图标设计来展示新闻信息,显示的更深的是编辑的强烈的主见与态度而不是技巧(de Varries,2008)。在报纸的资源还没有丰富的时候,使用新闻图片与信息图片表现了报纸对于该新闻的重视,以及希望引起读者的深度解读分析。在当地新闻版面中,所抽取的报纸样本很少有新闻配了这样的图片信息报道。这种报道模式是当代报纸编辑手法中,简化传播过程的常用选择。在澳门报纸的二战报道中得到有效使用,同样显示了报纸的编辑方针中对于国际新闻,特别是战事新闻的重视。

国际新闻强化处理,还表现在标题行数频繁使用多行题,如1945年7月25日的《复兴日报》头条新闻使用了四行题,“历史性之国际间会议(引题)杜邱史首次会晤(主题)杜鲁门邀请史达林共进午餐,丘吉尔访美总统作愉快谈话(双副题)”。标题行数的增多,与当地新闻的标题的弱化编排形成很大反差。国际新闻版面标题的字号也经常比正文的字号显著突出,甚至常常超过头版中“市闻”的新闻标题磅数。在内容处理上,国际新闻的标题往往更有创造性与美感。相对于本市新闻的标题平铺直叙,中规中矩的将新闻事实提炼出来,国际新闻更加富有变化,在表现手法上常常力求出新。比如1945年2月日的《市民日报》的英美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谈的预测性报道,其新闻标题就富有韵味,标题以“谜”为总主题,副题是“三巨头会晤,事件:快了快了,地点:未知未知”,形象地点出了众人关注的三方会晤扑朔迷离。

国际新闻在版面上的优势地位与编排手法多元或与澳门的新闻自由度有关。相对与本地新闻,国际新闻似乎更容易通过严格的检查,因为其内容与读者的存在低接近性,降低了市民的对相关政治的参与,相对与当地新闻难以影响有关政府统治的社会舆论。从生存考虑,澳门报业通过自我审查,选择对市民影响“低烈度”的国际新闻是安全的策略。另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虽然澳门的报纸主要依靠经营来维持生存与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报业及其它新闻媒体接受政府的部分资助(李小勤,2011;吴文博,2009),这种情况延续到澳门回归以后。政府的资助也衍生了澳门报业一个现象,虽然市场狭小,澳门长期以来存在着种类繁多的报纸。为了维持生存,澳门的中文报业在这一时期难以在新闻编辑上与葡澳政府的政策冲突。

四、中国内地新闻国际化调适

抗战时期的澳门报纸通常有四个版面,通常包括当地新闻版,国际新闻版和副刊版。相比于新闻版面,副刊在当时的报纸中占有优势,例如《市民日报》有两个版,《复兴日报》和《复兴晚报》都有一个以上的版面来刊登副刊信息。具体的版序设计,各报有区别,《市民日报》头版为市闻版,二三版是副刊,四版则是国际版,而《复兴日报》经常将本市新闻放在二版。但是澳门的报纸在当时往往没有专门的国内新闻版,相对于四分之一以上的版面安排给国际新闻,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内地新闻的弱化编排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今天的澳门报纸非常重视中国内地议题,以及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新闻。例如在澳门工作日的《澳门日报》一般有两个版面来报道中国内地新闻,对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闻事件也会各有一个整版来报道。对于抗战之前机胜利后的澳门报纸版面简略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内地新闻也有专门的版面来解读,显示澳门在抗战期间国内新闻的弱化编排是有特殊原因的,而并非归因于编辑方针的刻意为之。

没有专门的版面来容纳中国内地新闻,并非等于国内新闻在澳门报纸版面的缺失。根据所

抽取的报纸样本分析发现,报纸对于全局性的国内问题还是给予了充分的报道,有关中国民众抗战的报道是报纸的常态内容。这些新闻或这是中国内地战事的报道,或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杀戮与掠夺,在抗战后期,占多数的报道是报告中国内地陆续光复,盟军推进,及各地民众的庆祝报道。但是这些报道通常出现在国际新闻版,与世界各战区的报道一起,成为再现全球反法西斯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新闻并非由本埠或本记者在战地采写发回,其来源是世界各大通讯社的供稿。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解释为由于“孤岛”形成,澳门与中国的其他地区被人造的隔断了联系,战地采访对于资金人员匮乏的澳门报纸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其他各国的通讯社或者是国内的通讯社有效的弥补了这个缺憾。澳门与在香港1842年开埠以后,经济始终处于衰退之中,新闻媒体的资源势力也无法与香港相比(谭志强,2009)。在缺乏有力经济支撑的背景下,新闻的采访必然遭遇障碍。今天的澳门报纸都重视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新闻,除了派驻记者采访外,也同样依靠当地的通讯社或媒体来提供稿件,但是这些稿件绝不可能与国际新闻混合编排在一个版面上。

从另一方面看,澳门是东西方文化融汇的中间站,在抗战时期将中国内地新闻与国际新闻整合处理,体现了这种文化融汇。对澳门当代英文报刊的最近研究发现,这些报纸对于新闻有全球在地化的特征:当地新闻通过国际通用的方式达到普世化,而国际新闻也通过语言调式达到了当地化(localized)(林良玉,吴枚,2011)。抗战时期的澳门中文报业印证了这种“全球在地化”即新闻处理中将全球化与本地化再现战略融合为一体的理论(林良玉,吴枚,2011)。澳门的中文报纸虽然以华人作为主要读者,其新闻选择也以与市民具有地缘相连或文化相通的新闻为主,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性的特点,使该地报纸在编辑时自然地将“全球化”与“在地化”结合起来。在具体实现上,澳门的国内新闻有了国际化的背景,甚至淡化了国际国内的界限,将“市闻”之外的新闻事件都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加以解读。“孤岛”的特殊环境使得这种给编辑策略,有了更现实的实施空间。

五、本地新闻淡化政治议题

重视民生,特别是华人中的市民阶层,长期以来是澳门中文报业的核心价值(吴文博,2009)。澳门的居民构成长期以来表现了去精英化的特点,收入中下的普通市民是其人员的主流,在抗战时更是涌入很多中国内地难民。而且,长期以来澳门社会的华人与葡澳政府之间的沟通是分离与迟滞的,以华人地位的低下及怀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为特点(Lo,2009),这种情况造成了华人在葡萄牙殖民时期保持了独立的社会心态,也就使该地华人都在政经身份相似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紧密地社区,而华文报纸即服务这一社群。作为商业报纸,澳门的报纸即使是处在“孤岛”的特殊社会环境下,也依然把新闻编辑的战略定位于服务于普通的社区成员,而不是极少数社会精英或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葡人。

但是,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对当地新闻的报道从数量上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在新闻报道的深度与厚度上与国际新闻相比也有很大不足。1945年2月1日的头条新闻是“一元慈善奖券(引题)今日午间开彩(主题)”,在同一版面上还刊发了另一条主题及内容角度非常类似的新闻“南湾良友球场公开揽球(引题)四万元巨匠将可决定谁属(主题)”。次日的报纸延续了前一天的报道,头条是“一元彩券昨日已开彩(引题)头奖七二九二六”。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编辑解读认为读者对于彩券相关信息的关注与兴趣,报纸也迎合了这种受众需要,重视实用新闻的

编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新闻报道的匮乏,编辑只能对有限的新闻资源进行发掘。有限的版面来突出处理相同主题的新闻,也意味着很多别的新闻主题没有了与市民接触的空间。第二条新闻是“本月十一日起(引题)葡人狂欢节(主题)政府机关衙署一律放假(副题)”,显然政府有关的新闻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在二战末期澳门报纸上的本埠新闻越来越多,虽然不能与国际新闻的位置竞争,但是这种增加或许反映了报纸资源的增加,以及报纸编辑方针对于此类新闻的重视。在《市民日报》上,这些新闻被置于头版上仅次于广告的版位,位于版面下半部分。而新闻照片也开始在本埠新闻版面出现,而这在以前通常是国际新闻的专利。如1945年7月26日《复兴晚报》的“本澳新闻”版,刊登了两张新闻照片“市公局长巴路士”和“商会主席高可宁”。虽然这些照片多是大头照,不能提供与新闻事件有关的直接信息,但是新闻照片在本埠新闻栏目中的出现,也显示了该新闻题材地位的上升。而7月21日的《复兴日报》,配有短评“人之患”。

当地新闻更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显著增多。相对于1945年2月初在一版有三分之一弱的版面刊登“市闻”,1945年8月1日《市民日报》用了一半以上的版面报道发生在澳门的新闻事件。这些新闻包罗万象,但若以今天的新闻分类来定义,8成依然可以归于社会新闻的范畴。它们既有当时澳督庆祝执政周年市民参与报道,更有像“望厦米站照常售米”的短讯,甚至连“奴弥士医生休假一月”这样普通人活动的信息也被刊登。这一方面说明澳门的报纸在抗战末期越来越重视当地新闻,表现为新闻量的显著增多,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显示报纸的资源,还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这种新闻量的需求,所以在新闻选择上难免降低标准,将一些新闻价值较低的新闻也加以播发,当地新闻在总体质量上还有待提高。

抗战末期的澳门报业,对于新闻的选择延续了轻政治重民生的原则。当地新闻内容以市井百态而非政治新闻为主,体现出对于澳门小城市民的倚重与人文关怀。如1944年12月26日的“昨日圣诞难童皆欢喜(主题)分派难童餐秩序良好(副题)”延续了上一日同一主体的报道,在圣诞节这一西方人的传统节日里,将此新闻突出放在头版头条位置,体现了报纸的市民情愫。相对于普通人常常占据条新闻位置,传统的精英阶层的新闻却常常居于次要的位置,如“公务员之更调”的新闻,被放在“万余元钜窃案昨日在法院审讯”的消息之后的位置。而如果是精英阶层被放在头条位置上,其新闻主体也往往是与民生有关的,通常是新闻中的主角做出了有利于市民的工作,如“督查嘉路士病逝 在警界著有功勋闻者无不惋惜”。可见,澳门报纸一直保持着这种贴近市民的编辑方针(李小勤,2011),是与澳门这座小城的市民社会安闲平和与世无争的风格是紧密相连的。直到今天,相对于香港报纸的关注政治指点政府管理相比,澳门的报纸依旧是朴素和本源的。

六、结论

澳门中文报业由于居于东西方交流中点的特殊区位,具有了国际化与本地化的特色。这种国际化首先表现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而与其文化相通的中国内地新闻着力较少。同时,这种编排也应该考虑到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中国内地新闻在这一时期的淡化处理,部分归因于日本占领周边地区造成的“孤岛”,后者隔断了澳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而葡澳政府当时的新闻检查也恶化了这一新闻环境。澳门报业在该时期的新闻编排有些过度的“全球化”框架,是被动的而非在资源充分背景下的主动选择,是非常时期应对恶劣环境的理性选择,

也是报纸编辑部门从新闻选择与处理上对于复杂的新闻资源通过框架加以简化的过程 (Li & Liu, 2010), 是“孤岛”报业应对环境进行调适的一个维度表现。

另一方面, “孤岛”的现实语境也使得当地新闻的选择与编排上呈现了去弱化及去政治的特点。在抗战时期, 澳门的新闻界为反侵略的各界人民提供了精神和道义支持, 但是澳门本地的狭窄市场促使报业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来维持生存, 而“孤岛”的封闭环境使这种生存的压力加剧, 造成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的频繁业务变更 (吴文博, 2009)。选择民生新闻, 甚至是市井社会新闻, 而淡化政治议题, 可以更大可能地消除报纸与葡澳新闻检查政策发生冲突的几率, 从而维护报纸的生存空间。缺乏编排效果的实证数据, 我们现在难以考量这种编排模式对于澳门报业的运营有何具体影响, 但是从抗战时期的许多报纸在战后继续出版来看, 这种编辑框架对其生存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责任编辑: 毛湛文)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澳门日报 (2012年11月17日). 陈大白: 抗战时期澳新闻审查严. 《澳门日报》.

[Macau Daily (Jan.9, 2012). Chen Dabai: harsh press censorshi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acau Daily*.]

查灿长 (2006). 抗战时期的澳门《华侨报》. 《新闻界》, (4), 108-109.

[Zha, Canchang (2006). Macau Chinese Immigrant Times during the anti-Japances era. *Press Circles*, (4), 108-109.]

李小勤 (2011). 澳门华文传媒的咨询功能与监督角色. 《澳门研究》, (2), 128-133.

[Li, Xiaoqin (201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rveillance function of Chinese media in Macau.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2), 128-133.]

林良玉, 吴枚 (2011). 全球化视野下的澳门: 澳门英文报业的新闻框架研究. 《澳门研究》, (2), 112-127.

[Lam, L. I. & Wu, M. (2011). The globalization of Macau: new frame of Macau English press.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2), 112-127.]

谭志强 (2009). 香港与澳门新闻传媒事业的比较. 载余振, 邝锦均, 余永逸 (编), 《双城记III——港澳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澳门: 澳门社会科学学会.

[Tam, C. K. (2009). A comparison of journalism industry in Hong Kong and in Macau. In Yu Z., Kuang J.J. & Yu Y.Y., *The tale of twin cities III: a review and preview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Macau*. Macau: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Macau.]

吴文博 (2009). 民国时期的澳门报业. 《澳门历史研究》, (8), 138-149.

[Wu, Wenbo (2009). Macao newspaper during republican period. *Journal of Macau History Studies*, (8), 138-149.]

张荣显 (1998). 澳门传播法的回顾与前瞻. 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论文. 香港.

[Cheong, W. H. (1998). Inquiry in Macau media law: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sian Journalism-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Conference. Hong Kong.]

de Varies, J. (2008). Newspaper design as cultural change. *Visual Communication*, 7 (1), 5-25.

Enta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1-58.

Hynds, E. C. (1994). Editors at most U.S. Dailies see vital roles for editorial pa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1 (3), 573-582.

Li, Xigen & Liu, Xudong (2010). Framing and coverage of same-sex marriage in U.S. Newspaper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1 (1), 72-91.

Lo, S. (2009). Casino capitalism and its legitimacy impact on the politico-administrative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8 (1), 19-47.

Shah, D. V., Kwak, N., Schmierbach, M. & Zubric, J. (2004). The interplay of news frames on cognitive complex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 (1), 102-120.

Tam, C. K. (2003). Learn to be a Chinese journalist: the news media of Macao before and after the hand-over of administration at 1999. Paper presented at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of the Four Areas of Greater China. Taipei.